大国的胸襟 大国的气魄

□贺绍俊

贺享雍的《大国扶贫》是一部反映四川巴中地区扶贫工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真实地展现了在农村大地上正在实施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农村扶贫攻坚战。

精准扶贫战略让扶贫的实惠非常精准地传递到真正贫困的对象身上，这部作品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精准”两个字。首先是选题。《大国扶贫》的选题是由《中国作家》杂志提出来的。扶贫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基本国策，在治国理政中处于突出的位置。新时代给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中国作家》精准地体会到新时代治国方略的意义和宗旨，才能提出《大国扶贫》的选题。其次，这个选题选择作家贺享雍来完成也是非常精准的。贺享雍从事创作30多年，他始终坚守在乡村，关注着农村的现实，是对农村现实最了解、与农民最贴心的作家，让他来完成《大国扶贫》再合适不过。在这部作品中，贺享雍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零距离接近采访对象，与他们真诚相见、坦率交流，真实记录下扶贫工作的辛苦和实绩，透彻诠释了“大国扶贫”这四个字的沉甸甸的分量。贺享雍果然不负众望，他从多种角度非常精准地记录了巴中地区的精准扶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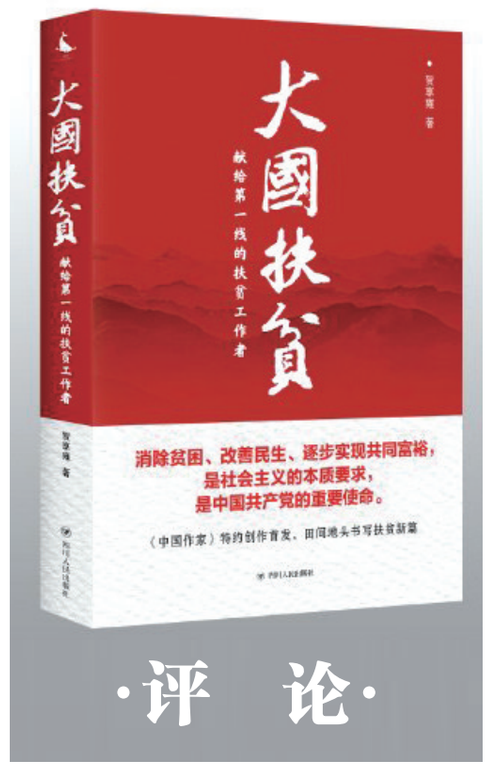
贺享雍的精准来自于他的“质胜于文”的写作方式。贺享雍擅长于讲述乡村的故事，他的“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以小说的方式忠实记录下家乡在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变迁。在这次为写《大国扶贫》的采访中，所接触的人物、所听到的故事，也是他最熟悉的，他如果将自己讲述故事的特长发挥出来，一定能把《大国扶贫》写得比小说还好读。但贺享雍分明收敛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采访实录，让采访对象直接说话，让他细致整理出来的数据和材料说话。当然，“质胜于文”只是相对而言，贺享雍收敛了讲述故事的优势，但他在叙述上的流畅、文字上的活泼，以及他在情感上的投入，仍是这部作品不可忽略的“文采”。

贺享雍的精准还来自于他实事求是的态度。贺享雍要做的是一篇命题作文，是要报道一个地区在扶贫工作上的先进事迹。但贺享雍并没有因为是歌颂的主题就一味地给书写对象评功摆好，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高度赞扬扶贫的成绩，也严肃指出扶贫工作中的问题。贺享雍并不是故意显出有批判性，而是以动态的、建设的眼光去观察扶贫工作，他发现的问题正是在工作进展中出现的问题，也预示着扶贫还要继续前行的问题。比如由于政府加大了扶贫力度，面对优裕的扶贫资金就有了利益之争，人们便采用“上访、哭闹”等方式来争利益，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显然是在扶贫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贺享雍丝毫不回避这类新问题，是因为通过对基层干部如何解决这类新问题的了解，就能看出扶贫工作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

贺享雍的精准更得益于他独立性的思考。贺享雍说，他这次写作《大国扶贫》的过程也是加深认识扶贫工作意义的过程。在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思考。贺享雍是把这次扶贫攻坚战放在整个扶贫历史环节中来思考的。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把扶贫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因此贺享雍首先带我们去认识扶贫工作中的“先行者”和“探路者”。贫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过去的扶贫也许只能在“低水平、低标准、低层次”上做文章，今天的扶贫攻坚战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标准更高，要求也更高，其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贺享雍的独立思考还体现在敏锐地发现扶贫工作中的问题，并对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他发现了有一种贫困户是因为好吃懒做而导致的，是否对这类贫困户进行扶贫应该慎重对待，否则会带来不良后果，它将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勤劳和节俭的传统价值观，“一旦当村民形成了勤劳与节俭不再值钱的观念，这个社会的贫困户恐怕会越来越多”。

说起来，这是一次命题作文的写作。命题作文规定了题材和主题，带有主题先行的特点，很容易纯粹从观念出发，陷入概念化写作的窠臼之中。命题作文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考验，好的命题作文也会成为不朽之作。比如鲁迅曾说自己写的是遵命文学，遵命文学不就是一种命题作文吗？被鲁迅称为遵命文学的《呐喊》《傍徨》等就是中国文学的伟大经典，这是因为鲁迅不仅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而且“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贺享雍的《大国扶贫》也是一次成功的命题作文，其成功同样在于这个命题也是他自己愿意表达的命题。他长年坚持写作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就贯穿着一个基本思路：关注农民在贫困中的生存状态。他深刻认识到：“消除贫困是世界性难题。”因此他对“中国式扶贫”有着透彻的理解，他把自己的理解浇注在“大国扶贫”这四个字上，写出了大国的胸襟，大国的气魄。



大国扶贫的巴中见证

□三江水

在世界不少地方，摆脱贫困，都是人们需要面对的艰难课题。但是，在面对这个艰难的课题时，如今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政府，有中国这样努力消除贫困的意志和决心，有这样严密的政策制定和实际行动。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各级干部，多年来在脱贫过程中持续不断的顽强拼搏精神和行为，不光使很多人走出贫困，命运改变，而且还表现出非常崇高的品格精神，很好地表达了国家的温暖情怀和个人无私帮扶的情感故事，这些都构成了一曲曲深情感人的现实社会历史书写，将在很多人的经历和国家民族的历史上成为重要的记录。

在诸多扶贫报告中，贺享雍的《大国扶贫——来自四川巴中的扶贫纪实》，是又一个重要的内容和部分。地处四川的巴中地区，是一个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山间小盆地。可在这个狭小山地的沟谷山岔里，却居住有300多万人口。这里“山美水美人却‘难’”，有的地方，一个村子，最大的田块只有几个平方米大，农业生产只能够靠人力进行。加之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常年干旱，很多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可尽管这样，这里曾经是川陕革命根据地所在，战争年代，贫穷的人们给革命以很大支持，当年120万人口，竟有12万参与革命活动，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有4万多人牺牲，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种种原因，这里成了如今国家扶贫攻坚的重要战场，成了国家上上下下关注的扶贫对象，摆脱贫困，和贫困作坚决斗争的战役在这里全面展开。

贺享雍，不负文学应有的社会情怀、使命职责，离开城市和自己的书房，走进大山深处，走进很多依然贫困和正在努力战胜贫困的人们中间，用心的观察、感受、采访、表达，为人们了解这里的扶贫攻坚斗争，书写了很多真实的现场情形故事，内容丰富、个性鲜明。作品提供的很多真实人物及其不同表现情形，像双田村的岳天武，全家六口人，住在破旧的木架房内，黑糊糊八面透风，墙上的裂缝能跑过牛去，下雨时，需要好几个盆子在各处接雨；田垭村人们如今还像原始“野人”般地在破旧的穿逗房里生活，堂穿壁漏，楼下养猪养牛、楼上住人；罗张窝村，因为山隔河阻，病人、难产的孕妇，都曾活活地死在涨水的河边等等，这些艰难贫穷的奇怪遭际命运故事，都非常真实具体和形象地描绘着贫困的严峻局面，将脱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等给予了接近充分的展现，引人关注。

《大国扶贫》在真实展开各种各样的贫困情景的时候，同时也在如何解决和消除这些贫困存在方面更加地用心。巴中地区的人们很早就提出，“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口号，在“八七扶贫计划”实施过程中，也曾经创造了“巴中经验”。2013年以来，巴中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力度，陆续组织派遣很多有爱心、有能力、有担当的干部到前沿贫困村子担任书记，摸排情况，精准发力，设法排解，实现脱贫，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作风、品质和精神行为，令人感动。比如分布于巴中各扶贫点上的刘泽训、文琼、马北晨、吴杰、“岳小胖”、谭真理、丁强、李林蔚、施元丞、包晓英、杨彬、杨超、向荣等，他（她）们无私勇进，敢于承当，深入基层，掌握政策，真情帮扶，或者帮助修路引水架桥，或者助之养猪养鸡种蘑，或者帮助搬迁盖房重教……虽经历多种艰难，但终究让像罗张窝村、青龙村的石德海、李本玉、杨绍美、杨青云、杨志虎、石绍云等很多人的贫困状态得到改变，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绩。这些艰苦奋斗在一线的年轻干部，在“黄牛当马使”的压力下，付出自我和智慧血汗，奋斗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地方，忍受压力、委屈、离别，为了他人的幸福表现出十分动人的品质和精神，是扶贫战线的优秀模范，很应当给予充分的赞美和表彰。贺享雍在自己的报告中，每涉及这些扶贫干部的表现时，都流露出真诚的敬意和赞赏言辞，十分自然。

贺享雍的作品，是一种抑制着激情和情绪的描述，他贴着地面行走，用客观理性的眼光观察和表达，因此非常具有真实存在的现场感，在描绘贫困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给人务实明确的感觉。作者没有躲避导致贫困的各种原因，但指出因为不思进取、生性懒惰和有些儿女赡养父母不尽责等一些客观原因导致贫困现象发生，见出乡村“失衡”现象，也表现出作者的理性批判精神和能力。在作品的最后，作者还欣喜地记述了巴中这些年来扶贫的重大成果表现和到处出现的温暖安闲美景，也是对于国家扶贫战略行动的积极回应。《大国扶贫》，巴中见证，脱贫攻坚，巴中战酣！

塑造基层扶贫工作者的动人群像

——读《大国扶贫——献给第一线的扶贫工作者》

□彭 程

精准扶贫，作为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政策，正在神州大地上既轰轰烈烈又扎实有效地开展着，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是这一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的体现。了解到这样的背景，再来阅读贺享雍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扶贫——献给第一线的扶贫工作者》，就更容易获得一种深切透辟的认识。

这部20多万字的作品，聚焦于位于川陕交界之地的四川巴中市的扶贫实践。巴中以其卓有成效的探索，诞生和积累了“巴中经验”，对于全国许多类似情况的地方扶贫工作的开展，具有典范和样本的作用。这部作品，便是对这种探索的文学化的呈现和解读，其意义自然毋庸多言。

对巴中的精准扶贫工作给予整体性的扫描和概括，是这部作品的雄心所在。与这一话题有关的诸多方面，都有较为丰富的介绍。譬如关于当地贫困的原因，书中指出既有自然环境的贫瘠恶劣，也有因为偏僻闭塞导致的当地百姓观念的保守和精神的萎靡等。又如扶贫是一项辐射甚广的经济社会建设工程，涉及到的领域、部门、人口、环节很多。如何确定贫困户，谁来扶贫、如何扶贫，市场、政府、社会组织和贫困群众等各个扶贫主体之间怎样分工、怎样配合和衔接，扶贫效果如何评估等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凡此种种，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即便是对这一话题全然陌生的读者，读了这部作品也会有一种鲜明的印象和清晰的了解。

对于这一项造福百姓的伟大实践，作者怀着饱满的激情，给予了充分的讴歌。书中用许多具体生动的实例，描写了因为种种原因陷入贫困的农户，在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自强不息，摆脱贫困，过上了殷实的小康生活。如通江县巴洲沟村开办商品猪养殖场脱贫致富的余定泗，就是一个典型。肢体残疾的他和全家人，在过了多年的苦日子后，赶上了精准扶贫政策的东风。乡里、村上各级领导和帮扶部门、帮扶干部的关心，县残联的无偿援助，政府的扶贫小额贷款支持，让他满怀信心地创业，克服各种困难，很快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家庭养殖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作为一位清醒的写作者，在展现扶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作者也冷静地介绍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揭示了这一伟大工程的艰辛和复杂。扶贫的动机无疑是良善的，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不少纠纷。如因为财政支持力度很大，一旦被评上贫困户，会享受到十分可观的物质利益，这就导致了一些人想方设法要当贫困户，不惜撒谎造假，为了争夺有限的名额互相算计，造成社会风气的劣变。而且，贫困户的划定方式，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变相鼓励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让勤劳肯干的人反而吃亏，这些恐怕都是始料未及的。针对这些弊端和隐患，作者以直面现实的坦率和勇气，在《按下葫芦浮起瓢——震荡中的村庄》等章节中，通过十分生动的事例给予了充分的描写，揭示了“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懒”的重要性，并围绕如何营造脱贫攻坚的良好社会环境展开了深入的思考。

如果说以上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涉及这一主题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写作都无法回避的背景，那么，在《大国扶贫》中，我们则看到了纪实文学样式在题材表达上所具有的特点，尤其是难以替代的优势。

为众多一线扶贫人物画像，展现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是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作者采写的众多人物，支撑起了全书的叙事框架。除了历史资料、统计数据等，许多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的复杂而琐碎的具体情况，都是在采访具体对象的过程中获得的，或者通过他们的口述，或者是经由作者的实地考察。每个人物都是一个信息库，从各自的角度提供了与扶贫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它们并拢归总起来，就形成了基层精准扶贫工作的总体面貌。

这样，在对各个方面情况给予本质性的准确把握的前提下，选择出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显得十分重要。以人物为脉络，串联起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更容易产生良好的表达效果。在这方面，这部作品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作者用集中酣畅的笔墨，描绘了多位活跃在扶贫第一线的领导和基层干部，特别是驻村帮扶的“第一书记”，塑造了这个群体的生动形象。他们身上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体现了人性的美好善良。

这样一些生动事例无法不让人深受感动：临危受命担任平昌县最穷的土兴镇党委书记的杨超，为了改变这里的贫穷面貌，组建队伍去外地招引本地籍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在北京的几天每天忙于工作，只是坐车时与天安门广场擦肩而过，一直到离京，再也未能够或者说舍不得抽出时间专程参观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而对于他们这样的基层干部来说，来北京的机会是极为难得的；南江县燕山乡扶贫办主任赵兰梅，夜以继日地忙碌，只能利用元旦假日举办婚礼，原计划在清明节假日去城里补拍一张婚纱照，但成行前又被临时性的工作挤占，只能寄希望于国庆假日了。这一类的故事，几乎发生在每个扶贫干部身上。他们的辛苦和付出，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帮扶对象的理解和感谢，甚至有一些贪图便宜的人，因为自己的不当利益诉求受到阻止，对他们横加指责甚至威胁侮辱。像平昌县坦溪镇村镇规划建设管理站的马主任，一位看上去干练坚强的女性，在接受作者采访的过程中，说起自己热心帮助某农户搬迁安置却屡屡受到对方谩骂，竟然数度哽咽，因为她的确忍受了太多的委屈。

在这部作品中，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体现得确凿而坚实。作者对他笔下的一线扶贫工作者无疑充满了感情，但并没有过度拔高，对他们遭遇的挫折、苦恼和无奈，思想中曾经有过的犹豫和退缩，也都给予了如实的描写，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惟其真实和普通，他们才更让人敬重佩服，因为他们为了实现扶贫脱贫的目标，牺牲了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安宁闲适，甚至个人的前途和发展。正是有这样一线扶贫者群体的默默奉献，才扎实推进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一步步改变着贫穷乡村的面貌。

对于一部叙事作品来说，生动的现场感和细节刻画十分重要，影响到作品的艺术品位，更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在这个方面，《大国扶贫》有着十分令人称道的表现。跟随着作者的脚步，读者仿佛置身于“青冈林绿、巴山深深”的现场，嗅到了山林草木的气息，农家猪圈鸡场里的气味，听到了农民们的方言腔调。叙述语言生动形象，不少地方具有影像般的鲜明感，读来印象深刻。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部作品扎实饱满的品质，从根本上讲来自于作者深入细致的采访。缺乏在生活的海洋中沉潜涵泳的功夫，难以想象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令人感佩，也再一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真正扎根生活，才有望收获硕果，写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精准扶贫”的时代史诗

□刘 艳

贺享雍纪实性长篇作品《大国扶贫》，原发《中国作家》2018年第5期，单行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这是一部全面描述与反映中国巴中地区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长篇纪实性文学作品。作品以革命老区、秦巴山区和深度连片贫困地区的“三区叠加”的四川省巴中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一系列做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历史经验为主要内容。《大国扶贫》书写“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扶贫脱贫攻坚战，符合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和奋斗目标，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的力作。《大国扶贫》浓缩了中国在全面迈入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巴中干部人民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行动和经验，热忱颂扬了第一线扶贫工作者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他们的担当与忠诚，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精神。

具备能够透彻地深入生活的精神，作家贺享雍以鲜明的深入生活、介入扶贫攻坚现实与实践的写作姿态，以难得的在场性和亲历性，凭借见证者的眼光和“非虚构”叙述，形成《大国扶贫》作品叙事的真实性。《大国扶贫》是作家深入生活的真实记录，它是记录“精准扶贫”和“巴中扶贫精神”的时代之作，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材料，可以说几乎是一部扶贫的地方志；同时，作家也没有停步驻足在材料和资料的记录、整理的层面，作品深入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记录下了扶贫干部跋涉和烙印在巴山崇山峻岭当中的足迹，他们的辛劳、奉献和对于贫困群众的点点滴滴的付出，一枝一叶总关情，作家发挥了他自“乡村志”十卷本以来的书写传统和写作风格，以一种情怀深在的人文关怀，记录下了一个个看似寻常不过，却又是中华民族扶贫攻坚战中的一个个历史性的事件，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留下了一部忠实于生活、记录“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史诗。

《巴中市志》是把巴中扶贫载入史册的，但历史的记载是宏大和简略的，有没有可能以文学性的笔触记录下扶贫“巴中精神”和历史经验呢？贺享雍《大国扶贫》所要完成的，就是这样的写作实践。如何将这些客观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数据，变得生动感人并有可读性、文学性，这对作家而言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也只有贺享雍这样出身乡土、心系乡土，也一直在写作乡土文学作品的作家，能够破解这样的写作难题和应对这样的写作挑战。面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巴中扶贫精神”及历史经验，并赋予写作对象以文学性，得益于作家贺享雍在“乡村志”十卷本中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写作经验。而且，破解难题、迎接挑战，离不开作家深入生活的能力和魄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乡村生活血脉相融的熟悉，贺享雍与柳青很是相像。柳青为了写作，可以从1953年到1967年在长安县王曲区皇甫村半山坡那座旧庙中宫寺一住就是14年，与农民同吃共住。贺享雍为了《大国扶贫》的写作成功，也是多次深入巴中，与扶贫干部切磋、访谈，深入到贫困群众当中去。如果没有与贫困群众一个锅里吃饭的劲头，群众不可能把身边扶贫脱贫的点点滴滴具实以告；假若没有与扶贫干部将心比心的恳谈和天长日久地打交道，不可能了解到他们工作的艰辛和苦乐兼备。像采访通江县副县长、扶贫移民局局长万学成，采访对象原打算只给作家40分钟时间，实际采访却整整多出了一个小时。这是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信任和知音之感，我们感到的则是一种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心往一块儿想和奋发向上的力量。对于扶贫干部工作的描述，不是停留在采访和数据，而是有着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曾被妻子长期误会的吴杰，错过对病危的父亲临终陪伴的丁强，曾被丈夫不理解并深深亏欠小女儿的杨雪梅，等等。《大国扶贫》真实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甘苦与共。没有深入生活的决心和扎实功力，不可能了解到“精准扶贫”中原来有那么多的插曲；为了“精准扶贫”能够落到实处，扶贫干部既需要制定详细可靠的政策，又要有一双慧眼，识破一个个冒领和想冒领扶贫优惠的农户所使用的招数，让扶贫帮扶对象准确无误，让扶贫真正地落到实处。

不读《大国扶贫》，你或许觉得贫困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读了《大国扶贫》，你才知道有那么多人曾经或仍然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才懂得了扶贫脱贫工作不止对于巴中，而且对于乡村振兴和中华复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任何一个有着人文情怀和悲悯之心的人，都会被贺享雍的文字感染和牵动心绪情怀。作品第三章《精准帮扶济苍生》里，“托起明天的希望”一节的杨阳因贫辍学，外出打工，读来让人心痛。杨阳在帮扶干部帮助下重新回来上学，一个孩子的学习经历充满了曲折，让你的心一直揪着，直到读到这个孩子又重新回了学校并且衣食无忧，才略释然。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乡村生活经验、内置的乡村视点，在当前乡土小说写作中显得凤毛麟角。考察贺享雍此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会发现，贺享雍乡土小说的隐含作者是一个农民出身又受过现代启蒙教育的乡村观察者、体验者和思考者。贺享雍“乡村志”小说具有内置的乡村视点，小说的叙述都不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是由一个能够融入乡村生活、身在乡村的人来叙述的。他的小说，是可以同时给城里人和乡村人看的。《大国扶贫》显示了贺享雍一以贯之的写作特点和写作风格，如果没有内置的乡村视点，依靠现代启蒙理性的视角或者乡村外来者的视点，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包罗万象、对扶贫与脱贫的书写几乎面面俱到的“非虚构”纪实性文学作品。

《大国扶贫》没有流于单纯的数据记录和道理说教，而是通过具体、生动、感人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下巴中扶贫的时代史诗式业绩。作品第四章“自古英雄出少年”、第五章“甘洒热血写春秋”，都是作者围绕扶贫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的生动书写。第六章“按下葫芦浮起瓢——震荡中的村庄”，写下了扶贫工作中的种种难题和曲折。第七章“不信春风唤不回——一个良好的脱贫攻坚社会环境如何营造？”是通过扶贫干部的访谈录和扶贫干部化解非贫困户矛盾及怨气的故事，来破解扶贫攻坚的切实难题。第八章“榜样力量，推动社会扶贫”，是通过三个扶贫爱心人士的自述，来讲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如何与扶贫干部共同扶贫攻坚的感人故事。作品第九章“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的希望：让乡亲们富起来”、第十章“大风起兮云飞扬——自强不息话脱贫”，读到的也是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和宏大简略的数据。这也是《大国扶贫》属于扶贫写作题材领域“非虚构”纪实文学力作的一个明证。

我们都知道，“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中国文坛备受瞩目的一股写作的潮流，是当代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写作伦理的努力，对信息时代仿真文化和经验化、表象化都是一种反拨。贺享雍的《大国扶贫》能够彻底走出书斋，一改作家蛰居书斋的写作习惯，深入生活，扎根生活，记录下一部与时代同脉搏、共心跳、同呼吸、共命运的扶贫脱贫的时代篇章，让乡村振兴的历史经验能够留下同时开启乡村振兴的未来可能性。贺享雍《大国扶贫》的价值与意义，或许就在于此。